《儒家者言》“未解章”初揭

——现存最早经传合璧的《孝经》抄本

苏成爱

安徽财经大学

内容摘要：在出土后的将近50年时间里，定县汉简《儒家者言》的第24章一直未得到确切的考释。其实，简文与《风俗通义》所引《孝经》相同，以此为突破口，可以确定此章为带有经说的《孝经》，是现存最早的经传合璧的《孝经》抄本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，弥足珍贵。

关键词：定县汉简 《儒家者言》 《风俗通义》 《孝经》

**引 言**

1973年，河北定县（今定州市）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了大批竹简，内容包括多种古代典籍。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从中整理出8种古书：《太公》《文子》《日书·占卜》《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》《哀公问五义》《保傅传》《论语》《儒家者言》。与其7种古籍不同的是，《儒家者言》本来没有书题，在传世文献中也没有找到与之相同的古书，整理者将这些竹简编在一起，是鉴于其长度、编纶、字数和字体相同，又由于这部分汉简大多与孔门师徒有关，故而定名为《儒家者言》。整理者依据其各自内容分章编次，共得27章。1981年，整理者发表了相关的考释[[1]](#endnote-1)，其中的26章都能从传世文献中找到了与之对应的篇章，唯独第24章付之阙如，即本文所称之“未解章”。竹简出土至今已将近50年，人们一直都在试图考释它，作出过种种猜想，却都苦于无确证。笔者不揣浅陋，试作考证，以期求正于读者诸君。若有一言可采，则区区幸甚。

**一、“未解章”与《孝经》**

“未解章”共6简：

肤受诸父母曾子**866**

何谓身体发肤弗敢毁伤曰乐正子**1831**

毁伤父不子也士不友也主[[2]](#endnote-2)□**313**

尊荣无忧子道如此可胃孝**1199**

□□教之所由曰孝□经□□**1845**

之且夫为人子亲死然后事**769**

不难发现，以上数句与传世本《孝经》中的部分文句相仿佛，可是又不那么一致：与866号简相比，以四部丛刊本为代表的现今通行本《孝经》（以下称今本）之首章《开宗明义》有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”,但紧接着是“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”[[3]](#endnote-3)，而不是如简文所言“曾子”如何如何；1831号简中的“身体发肤，弗敢毁伤”与今本《孝经》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如出一辙，但今本此句前面无“何谓”，简本“毁伤”后面紧接着的也并不如今本那样是“孝之始也”；313号简只有“毁伤”一词与见于《孝经》；1199号简“尊荣无忧，子道如此，可胃（谓）孝”发问句式虽与《孝经》曾子之言“敢问子从父之令,可谓孝乎”（第15章《谏诤》）相同，但所问内容迥异；1845号简前半“教之所由”与《孝经》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”对应，后半“孝□经□□”可能会是“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”的缩略语——“孝，天经地义”，但这两句一在《孝经》第1章，一在《孝经》第7章，相去甚远；769号简“之且夫为人子亲死然后事”似在论孝，却不见于今本《孝经》。看来，整理者阙而未释，事出有因。

然而，我们发现，“未解章”的确与《孝经》密切相关，至少有2支竹简上的文字可以完全肯定出自“《孝经》” ——866号简、1831号简。我们这里的“《孝经》”之所以加引号，是因为它与今本《孝经》有所不同。

遍检古籍，笔者发现这2支竹简上的文句只见于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》所引“《孝经》”（为便于比较，在二者相同的文字之下划横线，下同）：

866号简：肤，受诸父母，曾子（下缺）

“诸”“之”义同，常可互换，典籍习见，不烦举例。

《太平御览》引《风俗通义》佚文：“《孝经》：‘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曾子病困，启手足以归全也。’” [[4]](#endnote-4)

1831号简：何谓‘身体发肤’弗敢毁伤？曰：乐正子（下缺）

《风俗通义·过誉》：“《孝经》：‘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**，**孝之始也。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，三月不出，既瘳矣，犹有忧色。” [[5]](#endnote-5)

与上例相比，《风俗通义·过誉》所引《孝经》与简文在文字上并不是那么一致，但二者在文意上并无二致。古人引书时常撮其旨意，于无关紧要处每每有所损益，不足深怪。

《风俗通义》是现存所有的古文献中唯一能够找到与简文相对应文句的古书。这一令人欣喜的发现，使得其余4简的出处考释问题也有了着落。不过，在考释其余4简之前，有必要先说明《风俗通义》所引“孝经”的问题。《风俗通义》所引与今传本《孝经》经文相比，在经文之外还多出了不少解释性的文字。其原因在于：作者应劭与其他古人一样，引用“经说”（传文）常常“直称本经”[[6]](#endnote-6)，即应劭引“曾子”、“乐正子春”孝行事迹无疑都是出自东汉经说。这本来就是古书通例，无足深怪。

接下来，我们就要根据《风俗通义》引《孝经》经文、经说对866号简和1831号简进行尝试性的补足。这2简可以补作（经说部分用小字）：

[身体发]肤,受之父母，曾子[病困，启手足以归全也]。（866号简）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何谓“身体发肤，弗敢毁伤？”曰：乐正子[春下堂而伤足，三月不出，既瘳矣，犹有忧色。] （1831号简）

此处记乐正子春的笃孝言行，是从正面论证不可毁伤身体发肤。紧接着应该是从反面论证这一道理，故而接下来应该是：

[苟有]毁伤，父不子也，士不友也，主[不臣也]。（313号简）

313号简现已补足，我们再来看另外3简的简文。

另外3简文句也是《孝经》经传：

（一）1199号简是《孝经》佚文。

《孝经》全文基本上是按照曾子每发一问、孔子就作一答的模式阐述孝道。如今传本《孝经》第15章曾子问：“敢问子从父之令，可谓孝乎？”孔子答：“是何言与，是何言与！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天下；诸侯有争臣五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国；大夫有争臣三人，虽无道，不失 其家；士有争友，则身不离于令名；父有争子，则身不陷于不义。则子不可以不 争于父，臣不可以不争于君；故当不义，则争之。从父之令，又焉得为孝乎！”《孝经》中有少部分章节“有答无问”，当有脱简。

今传《孝经》第10章与第15章同样是论述为人子者如何事亲的问题，却只有答语：“子曰：‘孝子之事亲也，居则致其敬，养则致其乐，病则致其忧，丧则致其哀，祭则致其严。五者备矣，然后能事亲。事亲者，居上不骄，为下不乱，在丑不争。居上而骄则亡，为下而乱则刑，在丑而争则兵。三者不除，虽日用三牲之养，犹为不孝也。’”这是孔子在讲述孝于亲之“五备”——致敬、致乐、致忧、致哀、致严；而骄、乱、争“三戒”则是从反面进一步论证。“五备”大致可以说成是“尊”、“荣”和“无忧”，然而上文并不见有问及事亲是否应当使之“尊荣无忧”之句，有答无问，与《孝经》体例不合，则第10章前可据1199号简要补上一问：“[曾子问曰：‘事亲使之]尊荣无忧，子道如此，可胃（谓）孝[乎]？’”这句话是在其他古文献中都未见的《孝经》佚文。

（二）依今传本《孝经》，1845号简是《孝经》经文及其相应的佚传，可补为：“[子曰：‘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’何谓‘德之本]、教之所由’？曰：孝，[天]经[地义]……”

现申说如次：

此简简文有“曰”字，当与1831号简所见的《孝经》传文同例，系以“何谓”、“曰”发问并作答，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解经，与《春秋公羊传》的解经方式相仿。“曰”后应当是回答要解释的问题，“曰”前应当是用“何谓”对所要解释的经文进行提问。与“教之所由”及“孝”字相关的经文是“子曰：‘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’”，可据补。“教之所由生也”与“德之本也”的主语都是“孝”，二者密切相关，故经说应当同时解释，“何谓”后可补“德之本”句。解经时的提问，为了便于称说，当力求简洁，故而“教之所由生也”之“生”之“也”，可略去；同理，“德之本也”亦当省“也”。《孝经》第7章《三才》有孔子之言曰：“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。”考虑到古人有“以经解经”之例，且引经多力求简要，可将“孝，□经□□”补足为“孝，[天]经[地义]”。无论是说孝是“德之本”、“教之所由”，还是说它是“天经地义”都是在极力强调孝的重要性，二者可以互相发明。故而古人常常将之对举。如唐代张弧曰：“《经》云：‘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人之行也。’兼曰：‘夫孝，德之本，教之所由生。’治国治家者，立德为先；立德之本，孝之为始。”[[7]](#endnote-7)类似例子还见于《后汉书·延笃传》[[8]](#endnote-8)《隋书·孝义传》[[9]](#endnote-9)《北史·孝行传》[[10]](#endnote-10)等。

（三）对于769号简，我们很难在《孝经》中找到文字上非常一致的文句。但简文“之且夫为人子亲死然后事”句似乎与今本《孝经》末章《丧亲》有关，似为《孝经》之佚传：

“子曰：‘孝子之丧亲也，哭不偯，礼无容，言不文，服美不安，闻乐不乐，食旨不甘，此哀戚之情也。三日而食，教民无以死伤生，毁不灭性，此圣人之政也。丧不过三年，示民有终也。为之棺、椁、衣、衾而举**之**，陈其簠簋而哀戚**之**。擗踊哭泣，哀以送**之**；卜其宅兆，而安措**之**；为之宗庙，以鬼享**之**；春秋祭祀，以时思**之**。生事爱敬，死事哀戚，生民之本尽矣，死生之义备矣，孝子之事亲终矣。’”（本段中划线的文字与简文文义密切相关）

据此，补上相关的《孝经》经文，再补上佚传的缺文，769号简似可补足为：[擗踊哭泣，哀以送**之**；卜其宅兆，而安措**之**；为之宗庙，以鬼享**之**；春秋祭祀，以时思**之**。生事爱敬，死事哀戚，生民之本尽矣，死生之义备矣，孝子之事亲终矣。]……**之**。且夫为人子，亲死然后事[之以哀戚]……

综合以上考校，并参考现今通行本《孝经》，“未解章”的《孝经》经传似可复原为：

[子曰：‘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’何谓‘德之本]、教之所由’？曰：孝，[天]经[地义]……”[身体发]肤,受之父母，曾子[病困，启手足以归全也]。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何谓“身体发肤，弗敢毁伤？”曰：乐正子[春下堂而伤足，三月不出，既瘳矣，犹有忧色。][苟有]毁伤。父不子也，士不友也，主[不臣也]。（参照今本第1章《开宗明义》）

[曾子曰：“事亲使之]尊荣无忧，子道如此，可胃（谓）孝[乎？’”子曰：“孝子之事亲也，居则致其敬，养则致其乐，病则致其忧，丧则致其哀，祭则致其严。五者备矣，然后能事亲。事亲者，居上不骄，为下不乱，在丑不争。居上而骄则亡，为下而乱则刑，在丑而争则兵。三者不除，虽日用三牲之养，犹为不孝也。”]（参照今本第10章《纪孝行》）

[擗踊哭泣，哀以送之；卜其宅兆，而安措之；为之宗庙，以鬼享之；春秋祭祀，以时思之。生事爱敬，死事哀戚，生民之本尽矣，死生之义备矣，孝子之事亲终矣。]……之。且夫为人子，亲死然后事[之以哀戚]……（参照今本第18章《丧亲》）

**二、“未解章”重要的意义**

“未解章”实际应当称为“刘修墓本《孝经》经传”，抑或可称为“应劭所见本《孝经》经传”，虽吉光片羽，仍弥足珍贵，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。

定县汉简整理小组认为刘修墓出土的古书有8种，现在加上这部经传合璧的《孝经》，至少已有9种了；同时也首次弥补了以往在两晋之前的考古资料中没有《孝经》类文献发现的缺憾[[11]](#endnote-11)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它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经传合璧的《孝经》版本，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古墓，比敦煌遗书中的《孝经郑氏解》《孝经郑注义疏》《御注孝经》等经注本的残卷，要早数百年乃至上千年；提供了不见于其他任何古籍的《孝经》佚文1句，还有助于窥见两汉“以事说经”“以经证经”的解经方式。

《汉志》颜师古注引桓谭《新论》云：“《古孝经》千八百七十二字，今相异者四百字。”[[12]](#endnote-12) “今相异者四百余字”曾令后世的学者们大为疑惑：后世流传的古今文《孝经》之间并无如此之大的差别[[13]](#endnote-13)，桓谭时代的《孝经》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差别？而经本文补足的汉简本《孝经》，经文凡200言，与今传本相比，相异经文有20余字。据此可推知，汉代古今文《孝经》相异者达400余字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
古往今来，无数学者都曾为《孝经》的辑佚工作投入心力，仅仅清代至民国期间关于郑注《孝经》，我国学者就留下了20多部论著，日本学者也留下了10多部论著[[14]](#endnote-14)，不过所辑的“《孝经》佚文”其实只是《孝经》注文（经说），而非《孝经》经文，故而从严格意义上讲，只能算作《孝经》佚注，算不上《孝经》佚文。本文则复原出“曾子曰事亲使之尊荣无忧子道如此可胃（谓）孝乎”20余字的《孝经》佚文，同时还有不见于任何载籍的注文。

**汉简本《孝经》经传的发现，也为深入研究《儒家者言》提供了宝贵的思路。**既然它是经传合璧的《孝经》，就不应该被归入所谓的《儒家者言》一书。《儒家者言》的时间跨度曾被说成上述及商汤周文，下至乐正氏。很多学者都认为，乐正氏系该“书”所见时代最晚的人，对该“书”成书年代具有重要意义。“乐正子”三字恰好出现在“未解章”1831号简，所指为谁，最早的看法认为，当为春秋战国之交的乐正子春，曾子（约前505—前436）弟子[[15]](#endnote-15)；其实，战国中后期还有个乐正子克，孟子（约前372—前289）弟子；此外，我们也无法排除这里就是“乐正子”，即“子”后无“春”也无“克”，“子”是其后学对乐正子春或乐正子克的尊称。由于简文残缺过甚，几种看法又都能自圆其说，一时令人难以确定。如果《儒家者言》确实属于作于某一确定时代的古书，这当然至关重要。然而，经过本文的考证，我们明确了“未解章”应该属于经传合璧的《孝经》经传，经与传作成年代不一，且是独立存在的一部书，不属于某部“大书”，因此再要通过“未解章”的某一枝节问题来判定另外一部独立的“大书”的成书年代，显然就不合适了。而我们的意见是，除去“未解章”以外的《儒家者言》，如果真的是一本书的话，论证它的成书年代，应当分章而论，甚至有的章一章之内都要分成几部分来讨论，不应捆绑在一起讨论。因为很难保证其中没有第二个，乃至第三、第四甚或更多的“孝经”，也很难保证每一章的“经”都不带“传”。

当然，**汉简本《孝经》经传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索《孝经》学史上的一系列悬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**《孝经》作于何人，成于何时？这是2000多年来聚讼不已的历史疑案。关于其作者问题，有孔子说、孔子作而后儒纂杂说、曾参说、子思说、曾参弟子说、七十子之徒说、孟子门人说、乐正子春说、乐正子克说、乐正氏弟子说等10多种；其成书年代，则有春秋说、春秋战国之交说、战国初期说、战国中期说、战国后期说、西汉说等等。令人眼花缭乱，莫衷一是。关于其成书年代，今人多倾向于认为它不迟于战国，理由主要有3条：一是战国初期魏文侯曾作《孝经传》；二是《吕氏春秋·察微》曾明引《孝经·诸侯》；三是《吕氏春秋·孝行览》有论孝文字，大、小戴《礼记》分别于《大孝》《本孝》和《祭义》都有大段文字论孝（出土文献业已证明汉人二戴所编《礼记》诸篇基本上是先秦文字）。但是有些论者提出异议：一是魏文侯《孝经传》不可信；二是《吕氏春秋》中标明出自《孝经》的文字系后人窜入；三是《吕氏春秋》、二戴《礼记》论孝文字与《孝经》关系难以确定，与其成书问题并不直接相关[[16]](#endnote-16)。然而就是被认为与《孝经》关系难以确定的《吕氏春秋》、二戴《礼记》，其中《孝行览》、《大孝》、《本孝》、《祭义》论孝文句又都有文字见于经今人整理的汉简《儒家者言》第22章和第23章，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？它们是否和第24章“乐正子春”一段文字一样，是《孝经》传？《儒家者言》系考古发掘所得，其真实性不容质疑。然而，囿于学殖，这个问题尚难论定，我们只能翘首以待高明。

**三、余论：刘修墓为何会有应劭所见的《孝经》经传**

胡平生[[17]](#endnote-17)、郭沂[[18]](#endnote-18)、舒大刚[[19]](#endnote-19)、刘娇[[20]](#endnote-20)等学者都曾猜测刘修墓出土的《儒家者言》“未解章”与《孝经》有关，怀疑此章是《孝经》传注或解说，可惜都未能给出确切的证据。现对照应劭《风俗通义》2处所引“孝经”来看，其中不仅有经说，还有经文。给我们提供极大帮助、使我们将“未解章”与《孝经》联系起来的，是应劭《风俗通义》那独一无二的“孝经”引文。

应劭所见本《孝经》为何会同样出现在刘修的墓中呢？

我们先从两汉重孝的社会风气来窥测部分原因。两汉重孝：高祖刘邦尊其父为“太上皇”；汉武帝“以孝治天下” [[21]](#endnote-21)，并一直为汉家沿用，故后世史籍有“汉制，使天下诵《孝经》，选吏举孝廉，皆以孝为务”的记载[[22]](#endnote-22)；汉元帝12岁通读《孝经》；汉平帝时地方乡学置有《孝经》师一人；汉明帝曾下令建立校舍，广收不同民族门徒，“悉令通《孝经》章句”[[23]](#endnote-23)；就连因狂惑淫乱而即将被废去帝位的昌邑王刘贺也懂得引用《孝经》“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”为自己辩护[[24]](#endnote-24)；两汉除了两位开国皇帝之外，诸帝庙号前皆冠一“孝”字，亦可见一斑。《孝经》甚短，文不足两千，是汉代幼童必习、天下共诵、妇孺皆知的典籍，有众本行不废、并传于世也是可想而知的了。埋入刘修墓的，也就是当时众多传本之一种。

其次，我们可以从应邵及其家族与刘修墓的时空距离来窥测部分原因。应家开始发达的“中兴（25—55）初”，与汉墓竹简埋葬的时代相距不远。所谓的《儒家者言》，出自西汉中山怀王刘修之墓，刘修卒于五凤三年（前55），与应家开始兴起的年代相距不到100年。从空间距离上来看，刘修墓所在地（今河北定州市）距应劭出生地汝南南顿（今河南项城）也不过200多公里。同一种传本在这样的空间距离实现传布，完全是可能的。

最后再从应劭其人及其家族的状况来窥测部分原因。应劭（约153-203），字仲远（又作仲瑗、仲援），少时好学，博览多闻；汉灵帝(168-188在位)初举孝廉，先后任车骑将军何苗掾、泰山太守；后投袁绍，任军谋校尉，卒于邺(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东)。他认为，“夫国之大事，莫尚载籍也”[[25]](#endnote-25)，平生著述丰富，著作10余种，100多卷。应劭家族世代显达，以孝闻名。史载：“中兴初，有应妪者，生四子而寡。见神光照社，试探之，乃得黄金。自是诸子宦学，并有才名，至玚七世通显。”唐李贤注云：“应顺，将作大匠；子叠，江夏太守；叠生郴，武陵太守；郴生奉，从事中郎；奉生劭，车骑将军掾；劭弟珣，司空掾；珣子玚，曹操辟为丞相掾。”[[26]](#endnote-26)应妪得金的传说未必可信，但应家世代显宦、才名远扬的记载是可信的。王先谦集解引惠栋引《应亨集·让著作表》云：‘自司隶校尉奉至臣，五世著作不绝，乡族以为美谈。’”[[27]](#endnote-27)应劭深受其家庭影响。其父名奉，“事后母至孝”，亦曾举孝廉，又是当时的著名经师，博学多识。劭承家学，于经学、礼学、史学、语言学皆有很深造诣。生于世代显达、人才辈出、以孝著称的书香门第，应劭手中有祖传的《孝经》类书籍，也很正常。

综上来看，应劭所见本《孝经》，作为当时社会流传的《孝经》众本之一，同样保存在刘修墓中，并于1000多年后重见天日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**附注**：本文初稿完成于2009年，承蒙刘信芳教授多次审阅指正，特致谢忱；同时感谢刘钊教授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，感谢张廷银先生、张燕婴先生赐教。

**原文出处**：

苏成爱.《儒家者言》“未解章”初揭——现存最早经传合璧的《孝经》抄本[J].文献,2020(01):56-64.

**追记**：

2009年，笔者打算报考刘信芳教授的博士，曾于当年5月21日、11月15日通过电子邮件致函求教，当时小文所取的题目是《〈儒家者言〉“未解章”乃现存最早版本的〈孝经〉（含传）》，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在先秦两汉出土文献中没有《孝经》。2011年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被发现，墓中出土的简牍至今尚未公布。据雷焕昂先生《西汉海昏侯墓简牍中发现多种儒家典籍失传版本》介绍，刘贺墓中发现的典籍“包括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类、祠祝礼仪类、《论语》、《春秋》经传及《孝经》等”。雷焕昂先生在“春秋”后加上“经传”二字，而“《孝经》”后无“经传”二字，则刘贺墓出土的是不带经说的《孝经》。刘贺下葬的年代要比刘修早一些。所以，小文在《文献》刊出时将原标题改为《〈儒家者言〉“未解章”初揭——现存最早经传合璧的〈孝经〉抄本》，内容也作了相应的修改。但也有信息源告诉我们，刘贺《孝经》也见于刘修墓《儒家者言》中，如若果真如此，那么2009年笔者的标题所揭示的观点仍然能够成立。具体情况如何，我们翘首以待刘贺墓《孝经》的公布及其知情者的赐教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如今笔者从刘信芳教授门下博士毕业已经将近8年了，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已经结束将近1年，不胜唏嘘。敝帚自珍，自谓鄙说或仍可备为一说，特公布之，以期诸君赐教焉。

《文献》2020年第1期虞万里先生在《栏目导言》中指出：小文“揭示‘未解章’为汉代经传合璧的《孝经》抄本，意义非常重大。文献记载，马融为省两读之便，将经传合一。笔者曾指出：《丧服传》和《夏小正》之经传合一，是马融的先驱，今得《孝经》经传合一之简牍，可以证实经传合一之形式确实在马融之前已经产生。”虞先生所言传世文献所见经传分合诸事，乃管见所未及。多谢虞先生赐教。

2020年4月4日20:11:16

1. 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：《〈儒家者言〉释文》，《文物》1981年第8期，第13-19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“主”，原释文阙，系据竹简残笔补入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：《孝经》，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初编本，1937年，第2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李昉等撰：《太平御览》第15册，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《四部丛刊》本，1936年，第356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王利器：《风俗通义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180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王利器：《风俗通义校注》，第61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张弧：《素履子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3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王先谦集解：《后汉书集解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738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魏征等：《隋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73年，第1661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李延寿：《北史》中华书局， 1974年，第2827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2014年出版的《肩水金关汉简（叁）》发表了约抄于本始四年（前70）至建平四年（前3）的《孝经》类文献，暂无法判断它与定县汉简孰早孰晚。但据研究，它属于没有抄录完整经文的“单传本”《孝经》（黄浩波：《〈肩水金关汉简（叁）〉所见〈孝经〉解说残简》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，2015年4月22日），非如定县汉简之经传合璧，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王先谦补注：《汉书补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876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我们知道，今传本《孝经》传文所引经文、传世稀见本《孝经》经文及其传文所引经文，也包括几种古文本（如司马光“指解”本、日传“太宰”本、“刘炫”本、大足石刻本等），除了真伪难定的《古文孝经》多出真伪难定的《闺门》一章“子曰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”24字以外，各种传世《孝经》版本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别，只是分章稍异、文字微歧，而文字的歧异又只是有无“也”、“孔子曰”之类无关紧要字眼，无涉宏旨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舒大刚：《中国孝经学史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436-438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何直刚：《〈儒家者言〉略说》，《文物》1981年第8期，第20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详参杜娟：《1978年以来〈孝经〉研究综述》，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2008年第3期，第2-7页；肖永明、罗山：《近年来〈孝经〉研究综述》，《云梦学刊》2009年第第3期，第24-28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胡平生：《〈孝经〉是怎样一本书》，《孝经译注（前言部分）》，中华书局，1996年，第9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郭沂：《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388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舒大刚：《〈孝经〉名义考——兼及〈孝经〉的成书时代》，《西华大学学报》2004年第1期，第38-42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刘娇：《汉简所见〈孝经〉之传注或解说初探》，《出土文献》2015年第1期，第293-303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赵克尧：《论汉代以孝治天下》，《复旦学报》1992年第3期，第80-86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王先谦集解：《后汉书集解》，第717页。“皆以孝为务”，据《全后汉文》引袁宏《纪》补（严可均辑：《全后汉文 下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9年，第686页）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王先谦集解：《后汉书集解》，第890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王先谦补注：《汉书补注》，第1306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王先谦集解：《后汉书集解》，第567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王先谦集解：《后汉书集解》，第568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
27. 王先谦集解：《后汉书集解》，第568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27)